

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 本文原載《思與言》38-1 (2000年3月) : pp. 147-184。

摘要

全球化以及地方與全球的直接聯繫可能，造成民族國家的疆界毀壞。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地方（社區）的再興起，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也使認同複雜化。然而民族國家功能的衰退，並不等於民族主義的終結；認同的複雜化，也未曾使民族屬性不再能作為認同的符碼。跨國社會空間固然瓦解了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聯繫，但除了「功能性的跨國社會」及「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全球化時代中的「跨國民族社會」也正方興未艾，顯示出民族主義強大的跨國凝聚力量。當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的「世界體系」架構逐漸失去適用性時，某些跨國企業也已獲得了真實的跨國性，但主觀上，這些企業仍無法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全球化也帶來了關於普世價值觀（「普世人權」）的爭論，北約為解決科索夫問題而攻擊南斯拉夫，即以「人權高於主權」為藉口。然而經過深入的分析，我們便能瞭解，北約攻擊行動的背後主要是美國的帝國主義企圖和歐洲的文明衝突；「普世人權」依然是一個難以在理性對話中建立起來的概念。

關鍵字：全球化、全球地方化、跨國社會空間、民族主義、跨國企業、普世人權

Gloc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global connection cause the declining of borders of nation-states. The ri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eakens the power of nation-states and makes the identity formation more complex. But the declining of functions of nation-states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nationalism. National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by the identity formation. Though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release the solid connection between an ethnic group and a state's territory, the rising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eties indicates that ethnic identity or nationalism can also be evolved transnationally. Som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gotten a real "transnationality". But subjectively such a transnational company is still regarded as a company, which belongs to a nation. Globalization causes also debates about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 The NATO for example wanted to legitimate their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with the belie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ut our analysis will indicate, the real reasons of NATO's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include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a consensus about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 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指正建議。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線與歐洲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NSC 89-2412-H-009-001-）的部份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問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1999.12.11-12），原題為：「全球地方化、跨國社會空間與民族國家：普世主義、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兼容與矛盾」。今文有所修改。

孫治本**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全球化絕不只是經濟全球化或全球單一市場的形成。全球化是多個面向、多種價值觀、多種認同彼此兼容／衝突的複雜圖像。本文的中心論點是：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不僅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也使認同複雜化。但這些現象並不能宣告民族主義的終結。換言之，筆者並不認同那種樂觀地認為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可能）會一起成為過時了的想法（如 Ulrich Beck 1999），但亦不同意傳統的國家與國際架構能一成不變地維持下去。筆者提出的命題是：全球地方化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功能^[1]；然而全球地方化並未終結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雖然，後者在前者的衝擊下，其形式日顯複雜。

因此，本文先於第二節及第三節論證「民族國家如何在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夾擊下式微」後，將從三個層面，描述全球化的力量並未終結民族認同及特殊價值觀，而只是使後者獲得了更為撲朔迷離的表現方式。首先在四—（一），由對削弱國家功能的主要力量之一——各種跨國社會空間的分析，我們會瞭解，跨國社會空間瓦解了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聯繫。然而有一種跨國社會是立基於民族認同而形成的，此即跨國民族社會，這證明全球化不僅未終結民族意識，反而使民族意識得以跨國地發展。在四—（二），筆者將論證，客觀上已獲得真實跨國性的跨國企業，仍無法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四—（三）則想探討全球化是否使超越民族、宗教與文化的「普世價值觀」的形成成為可能。對普世價值觀（自以為是）的信仰，及傳統主權國家概念的沒落，使北約在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行動中，以「人權高於主權」作理由（藉口）。然而經過本文的分析，我們會明瞭：「普世人權」仍是一個困難的概念；一如從前，某種被宣稱為普世有效的價值觀，可能只是帝國主義或文明衝突的外衣。

二、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的式微

何謂全球化？借用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說法，全球化是「距離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Beck 1999: 30）。

貝克的說法實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全球化的定義相呼應。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指涉的是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轉變^[2]，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Fernwirkung），而全球通訊與大眾交通系統強化了這種「對遠方的效應」（Giddens 1999: 23）。不論是「距離的消失」或「對遠方的效應」，都意味著「疆界毀壞」；民族國家、文化的界線，越來越無法限制人員、資訊、資金的流動。關於「疆界毀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強調的是全球市場的形成^[3]，但「距離的消失」、「疆界毀壞」實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個層面。

全球化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4]當然，這是一個很難界定起點的過程，但如從「疆界毀壞」的含義看，全球化應屬於一個晚近的現象。尤其當世界仍分成東、西兩大陣營時，是無法說世界是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疆界毀壞」涉及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或者說民族國家越來越難在種族的純粹性上，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固守其疆界。這是晚近全球化現象與「世界體系」概念的主要差別，因為在世界體系理論的分析架構中，民族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詳第五節）。^[5]

甚麼是民族國家呢？依筆者的看法，民族國家最大的特色在於：國家既是最高的權力架構，又是最高的認同單位（所謂的民族或國家認同）。兩種性質集於一身，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較新的現象^[6]。此外，民族國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現代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形成的。（換句話說，尚未有跨國的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逐漸主宰了世界舞台，然而全球化使民族國家遭遇了對手，這些使民族國家開始沒落的力量包括各種跨國組織、地方（甚至社區）的再興起以及跨國社會。當然，民族國家的架構式微但並未消失，以民族國家為互動主體的國際架構亦依然存在，但是當上述新興力量躍升於世界舞台後，「多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出現了，民族國家必須與各種跨國力量競爭或合作。^[7]

尤其甚者，當經濟、文化事件，甚至於對生態的破壞，都已跨國地進行，民族國家對這些跨國事件，不但無能規範，還必須承擔其負面後果（例如日益增加的失業與貧窮），日顯疲態也就不足為怪了。^[8]關於藉各種形式的跨國力量所形

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的分析，我們放在三一（一）進行。以下我們先探討全球化與地方化同時發生的現象——所謂的「全球地方化」對民族國家的衝擊。

三、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

衝擊民族國家架構的，不只是各種跨國的勢力，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也挑戰著國家的權威。事實上，（再）地方化與全球化是當今同時發生的兩股趨勢。尤其是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可以使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再「偏遠」，使地方得以（越過國家）直接與全球（某個地方）相聯。地方受著全球的影響，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這就是 Roland Robertson 所說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Robertson 1998: 203; 參閱 Albrow 1998b: 308)。大眾傳播媒體、全球行銷體系，使地方文化、地方產品有可能風行全球。再從前述想像力的重要性而言，跨國文化工業為了不斷推出「新穎」的產品，必須從地方發掘舊的素材，包裝成全球性的新商品（比如狄斯奈的「花木蘭」卡通電影）。這不能簡單地用「文化帝國主義對地方文化的剝削」來形容；事實上，當地方可與全球直接相通後，文化帝國主義就必須面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9]。而全球化也使各種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間遭遇頻繁。

當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客觀條件，例如前述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以及普遍的富裕（雖然仍有相對的貧窮）、教育程度的提高，卻使地方、社區的實力增加。例如網路、有線電視，不但是一種大眾傳播媒體，能讓世界走進家庭；也是一種小眾傳播媒體，使地方、社區的內在聯繫緊密起來。

這種地方和全球的直接聯繫，並非全新的現象，中古世紀也有類似的情形。當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之前，歐洲存在著兩種架構，其一是天主教會的普世架構，其二是封建領主的地方架構，界於普世與地方間的國家架構則尚未興起。如同今日的全球—地方關係，中古歐洲的普世和地方兩種架構間是有直接聯繫的^[10]，因為不只是總主教，連主教都要由梵諦岡直接任命，主教又能與聞地方事務。所以，許多歐洲民族國家成形時，都免不了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例如普魯士於 1871

年統一德國後，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主教的勢力（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194）。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興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用起源於日本經濟界的概念—「全球地方化」來表示（參閱 Robertson 1998: 197-203）。對於跨國集團而言，如果只注意到全球化，而忽略了地方化，就可能商場失利。例如福特及通用兩大汽車集團，面臨全球化的趨勢，及出於對東亞新興競爭者的懼怕，兩者均對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做了全球化的工作分配，各分公司的自主性因此減弱，成為集團世界版圖之下的組織組件。福特和通用且著手發展「世界車」（能賣到世界各地的車種），並以東亞新興競爭者為主要假想敵。歐洲子公司分配到的任務是發展中、小型汽車，美國分公司則負責發展中、高級車。然而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車主是較注重品質和品味的，對兩大集團歐洲子公司的新車種接受度低。結果 1997 年間，兩大集團在歐洲的形象和市場佔有率均大幅下降，逐漸被歸為與東亞汽車同一等級。而來自西歐的所謂世界車，在世界其它地方的銷售也不是很理想（*manager magazin* 1998（5）：54-65）。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發生，所以並非像世界體系理論設想的那樣，全球市場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半邊陲—邊陲的分工架構，而是全球化同時有「中心化」和「解中心化」兩種作用，前者指資本、權力、資訊的集中過程，後者指地方、社區分享原中心區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強（Beck 1999: 69）。不過，全球化也可能瓦解某些現有的地方或社區脈絡。全球化產生了跨國和跨洲的「社群」，這些社群建立起了新的社會相關性，使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生活，這是全球化的「結合」作用。然而此種跨國結合，也「分解」了某些傳統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全球化不但威脅著國家的資訊和財稅主權，它那種使天涯若比鄰的力量，也可能使直接的鄰居關係凋零，因為「遠方的鄰居」越來越重要（參閱 Beck 1999: 68-69），特別是網路所支持的跨國聯繫，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然而社區的傳統層面固然受到衝擊，卻可能獲得新的需求與力量。不僅僅是因為全球地方化現象能使社區從更大的範圍獲取資源，也因為國家功能的減低，使得地方、社區，或者總括地說—公民社會的各種團體，必須承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也就是說，全球化引起的諸多問題及民族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式微，

迫使（民主）政治必須向國家層次以上（跨國（民主）政治）^[11]及國家層次以下（基層民主、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團體）發展^[12]。或者可以這麼說，當民族國家還興盛時，公民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國家式微後，公民社會一方面向下分解於各種小社團中，一方面向上跨國地形成跨國公民社會（各種跨國非政府組織）。^[13]

四、跨國勢力、普世主義 vs. 民族意識、文明衝突

如同在前言所說，以下從三個層面探討民族意識、文明衝突在全球化時代轉型但並未消失的現象。

（一）、跨國社會空間與民族認同

對民族國家架構的第一層威脅—跨國力量，絕不僅是由經濟力量所構成。事實上，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已經形成，使「社會」與「國家」範圍的重疊性瓦解^[14]。人口的全球流動，是跨國社會空間形成的力量之一，Arjun Appadurai 使用全球「族群空間」（或譯「族群風貌」（Ethnoscape; ethnische Räume）一詞來表示此種現象。在此，族群空間指涉的是某類流動人口組成的空間，這些流動人口包括觀光客、移民、難民、流亡者、外籍勞工等。這些在全球範圍移動的族群，對各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越來越大，然而此種移動性的族群，其範圍不易界定，其認同更是充滿了複雜性。全球族群空間的跨國流動性，實際上是一種「解空間化」（Enträumlichung），使民族與疆域的聯結中斷（Appadurai 1998: 11-13）。

「想像力」對人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也促使了「解空間化」。^[15]我們不再只是根據自身的經歷和周遭的事物去理解世界、規劃未來，而是我們的腦海中充滿著各種「可能的」生活形式和風格。這種對於可能的生活的想像，常是經由大眾傳播媒體而來。大眾傳播媒體將遠方、它處的風貌拉近，成為我們想像的一部份（Appadurai 1998: 20-37）。^[16][\[CPSun1\]](#)Joshua Meyrowitz 由「參考

團體」理論的「概括化他人」的概念(由 Charles Horton Cooley 及 George Herbert Mead 所提出)，引申出「概括化它處」(das generalisierte Anderswo)的概念，表示在全球化時代，人可以經常(想像)站在它處、遠方，來知覺、評估自身所在之地(Meyrowitz 1998)。

移民、難民數量的成長，自然是使民族與疆域的聯結中斷的主要力量。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全球「在外國出生的人口」(亦即現居某國，但在他國出生的人口)從 1965 年的 7,590 萬增加為 1985 年的一億零 550 萬。雖然其佔全球總人口的比例由 2.3% 降為 2.2%，但在富裕區域，此一比例均有所增加，例如，1985 年時，在外國出生的人口佔中東國家總人口的比例為 34.2%，在大洋洲為 16%，在北美為 7.8%，在歐洲為 4.7%，均較 1965 年的比例為高(World Bank 1995，轉引自 Hauchler/Messner/Nuscheler 1997: 100)。

「在外國出生的人口」尚無法概括移民社會的規模，因為這並不包含第一代移民在移入國出生的下一代。當然，若以國籍為標準，一樣無法計算出一國移民社會的規模，因為這並不包含已取得移入國國籍的移民。然而就算僅以國籍為標準，也可看出像德國這樣曾經標榜種族純粹性的國家，都漸漸成為移民國家了。根據 1997 年末的統計，在德國的外國人(即無德國國籍者)約 740 萬人，其中 410 萬居留時間已超過八年。在 740 萬外國人中，土耳其人(幾乎都信奉回教)便佔了 210 萬(*Der Spiegel* 1999 (2): 26)。跨國、跨民族通婚的個案，也隨著全球化增多了。1960 年時，在德國出生的新生兒，只有 1.3% 的父親和/或母親為非德國人，到了 1994 年，此一比例已高達 18.8%(Beck-Gernsheim 1998: 154)。移民潮有可能使西方社會不再是白人的世界。1995 年時，美國的非拉丁美洲裔白人佔總人口的 74%，估計到了 2050 年，此一比例會降為 53%(Huntington 1997: 275)。一些西方國家生育率極低，例如德國，若無外來移民，人口將由 1990 年的 7,910 萬人減為 2050 年的 4,840 萬人(Buttler 1993: 55)。從經濟上而言，這樣的社會需要外來移民(參閱孫治本 1995)，而其富裕的經濟亦能吸引外來移民，因此加速了國家種族純粹性的瓦解。

移民使國家內部的民族成份複雜化，其結果未必是和諧的多元文化社會。以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而論，固然有涵化的事實，但土耳其人並未充分整合入德

國社會，在年輕土耳其人中，退回土耳其生活世界的趨勢越來越強，一些在德國成長的土耳其青年，喜歡去只放土耳其音樂的狄斯可廳，或在豪華大飯店舉行土耳其舞會。回教信仰更成為德國土耳其社會與其餘德國社會間的一條界線（全德有約 400 座清真寺）（*Der Spiegel* 1999（2）：28-29；參閱 Yalçın-Heckmann 1997）。

人口遷移還形成了同一民族所組成的跨國社會。依筆者之見，我們可以區分出三類跨國社會空間，第一種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例如跨國集團所掌控的跨國商業社會；第二種是「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空間」，亦即俱有相同風格、嗜好的人，在全球範圍彼此聯繫而形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特別是網路的普及，加速了此類社會空間的發展。像網路這樣的溝通科技，使「同時生活在這裡和那裡」成為可能，空間因此失去了認同指標性，藉由溝通科技得以隨時與全球各地聯繫、共同工作的人，已無所謂生活在哪個空間，而只能說目前處於時間上的哪一點（Bauman 1998: 326-327）。1999 年夏天，3com 在美國市場推出了不需要電話線，甚至不需要行動電話，便可直接上網的迷你電腦 Palm VII（*Spiegel Online* 1999.11.17），使人隨時、隨地得以透過網路直接與全球相連。為此，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做了一個實驗，派遣兩位記者帶著 Palm VII 至紐約，於 24 個鐘頭的時間內，隨時上網與明鏡週刊聯繫，網友則可在網上讀到他們傳來的訊息，並參與討論此一隨時、隨地上網的可能性（*Spiegel Online* 1999.11.18）。

第三種跨國社會空間則是「跨國民族社會空間」。三種跨國社會空間都衝擊著民族國家架構，然而跨國民族社會空間卻顯示，民族國家的框框雖然鬆動，民族認同卻未必相應式微，反而成為同一民族在全球範圍組成跨國社會的原動力。借用 Pieterse 的詞彙，我們可以稱跨國民族社會的民族主義為「不在場的愛國主義」或「來自遠方的民族主義」（Pieterse 1998: 94）。信奉回教的民族所組成的跨國民族社會空間，且得到宗教組織的支持；而跨國華人社會空間，則常獲得兩岸政府的支持與利用。Ludger Pries 對美國紐約的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也顯示，在美國—墨西哥跨國社會空間中，也包含政治關係，即墨西哥移民對母國的政治發生了影響（Pries 1998: 59-690）。

總之，跨國民族社會空間的方興未艾，顯示民族國家的式微，並不等於民族主義的沒落。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跨國民族社會的現象，亦即民族的跨國分佈，也意味著不同民族直接遭遇的機會增加，使地域上的國家空間及個別當事人的生涯史，都成為不同文化彼此激盪的場域，而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民族認同。因此，「誰是美國的黑人？」「誰是猶太人？」甚至「誰是德國人？」這樣的問題，都越來越難以回答（參閱 Beck-Gernsheim 1998）。

（二）、跨國集團、民族國家與民族認同

根據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資本主義法則雖然使得世界成為一個統合的、分工的「世界體系」，然而當他在分析此一世界體系內的剝削關係時（亦即中心—半邊陲—邊陲的架構），國家仍是重要的單位。這不僅是在世界體系形成的早期—16 世紀歐洲的世界經濟出現時（Wallerstein 1986），甚至於本世紀 80 年代初（Wallerstein 1984），國家和國際體系都是世界體系的主要單位和架構。所謂的跨國企業，仍只是某民族國家的跨國企業。

跨國集團當然很早就存在了，然而從前的跨國集團，儘管有許多海外子公司，但我們仍可清楚地將跨國集團定位為某一個民族國家的跨國集團，例如有許多海外子公司的「福特」（Ford）是美國的跨國集團。然而最近幾年，一方面許多跨國集團在發源國以外之員工數及產值佔整個集團的比例持續上升，股權的全球性分散程度也持續提高，而且有可能為了節稅而將總部移至他國；一方面，1997 年以來經常發生的不同國家的規模龐大的跨國集團間的合併，使得一些跨國集團越來越名符其實，也就是客觀而言，這些跨國集團真地無法再被視為是某國的跨國集團了。然而，這樣的跨國集團卻未必真能與民族認同完全脫離干係。以下我們想探討一下，德國的（跨國集團）戴姆勒—賓士（Daimler-Benz）集團和美國的（跨國集團）克萊斯勒（Chrysler）集團合併為戴姆勒／克萊斯勒（DaimlerChrysler）集團後，新的集團是否可被視作某一國的跨國集團的問題。

1998 年公佈的戴姆勒—賓士集團和克萊斯勒集團的合併案，不僅是至當時為止製造業的最大合併案，其另一個特殊意義是：這是「德國」最大工業集團與

「美國」第三大汽車製造集團的合併，合併後的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其半數以上的股權將掌握在德國以外的股東手中（*Wirtschaftswoche* 1998.05.14）。民族與國家主義顯然不構成此一跨大西洋企業合併的阻礙。

像戴姆勒／克萊斯勒這樣的集團，是否已完全脫離民族國家的定位呢？富可敵國的跨國集團，是否會使民族國家的架構崩解呢？以下我們先處理第二個問題。必須瞭解，所謂的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行者（最主要的是跨國企業集團），利用「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在全球範圍內操作。雖然，資本主義的執行者，會期望建立對其有利的全球統一的經濟基礎架構，也就是要求各國都能貫徹經濟自由化，然而，如果沒有國與國間在經、社條件及社會福利、環保制度上的差別，以全球作為資本主義執行者的操作範圍，便失去了意義。所以，當跨國集團的勢力足以威脅民族國家的架構時，其所樂見的，並非國家機制的停擺，而是國家機制能為跨國企業效勞。經濟全球化確實使民族國家的疆界洞穿。至今為止，對於資本主義的束縛—民主政治、社會福利制度、環保規範，主要仍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下起作用（而且三者只有在先進工業國家才較完善），至今仍未有全球統一的民主政治、社會福利或環保制度。於是，富可敵國的跨國集團，便可利用國與國間的制度與客觀條件區別，選擇最有利的生產、管理、納稅所在地，並挾其經濟實力，周旋於各國之間，要求改善投資環境。這就是 Zygmunt Bauman 所說的：

「全球資財、貿易及資訊工業的流動性，及其無限制追求其目標的自由，有賴政治的區隔化和世界舞台的分割。我們可以這麼說，『弱小的國家』是有利於他們〔跨國經濟勢力〕的，．．．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被認為適合獲得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會的財力支援，其必須無條件接受的前提是：把門戶打得更開，並且放棄任何一種自主的經濟政策的想法。弱小的國家正是世界新秩序（太常被誤解為世界無秩序）自我維持和再造所需的。」（Bauman 1998: 322）

反之，（真正有效的）跨國甚至普世的政治機制，是對跨國集團不利的，因為普世性的政治合作機制，有能力重新束縛以全球為運作範圍的資本主義。有效的普世性政治合作機制當然尚未建立起來^[17]，但歐盟已是區域政治合作的最佳榜樣。在歐盟經濟區內，跨國企業將越來越難離間個別歐盟成員國，因為有越來

越多的聲音要求在歐盟範圍內建立起跨國民主機制（參閱 Beck 1999: 205-210; Goodman 1998），並縮小各國在稅制、社會福利、環保標準上的差異。例如德國與法國領導人便要求整合的歐洲必須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歐洲，且曾呼籲在七國高峰會上討論全球化的社會後果（*Spiegel Online* 1998.12.01）。

民族國家的架構尚未消失，而跨國集團需要弱小的民族國家。不過，就跨國集團本身而言，其「跨國性」已經越來越真實，亦即客觀而言，跨國集團越來越難選擇某個單一民族國家，作為其主要結盟者。跨國集團的行動，整體而言，已經不容易被視為對某個國家有利、對另一個國家不利，而可能是對某個國家的某一部份人及另一個國家的另一部份人有利或不利。例如，企業強化其全球戰略，可能不利於先進國家的藍領勞工，因為生產基地轉移至低工資國家了（或者引進的廉價外籍勞工越來越多）；但先進國家俱備全球視野的專業人士，卻是企業全球戰略的受益者。

因此，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衝突常常不是民族國家間的衝突，而是某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衝突。這是因為此種衝突的雙方，往往不是國家與國家，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行者與某國（本國或他國）內部一部份人民的衝突，而同時，該國內部亦一定有部份人民支持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行者。比如，德國拜爾在台設廠案，並未導致台灣與德國間的衝突，卻引發了台灣內部的衝突。而德國的失業者如果埋怨外國人強走了他們的工作位置，他們根本無法指出哪一個國家是罪魁禍首，這是因為跨國集團遊走四方，因此無法把德國的失業問題記在某一特定國家的帳上。然而，德國的排外勢力卻可能將矛頭指向境內的外國人。這是一種種族衝突，但卻並非沿著國家界線發生。所以，在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一方面仍可能引發傳統的民族與民族間、國家與國家間的衝突（如前南斯拉夫諸民族間的戰爭，如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潛在衝突）；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涉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經常引發內部的衝突，而由於移民使國家的民族混雜性提高，民族主義可能引發一國之內的民族衝突。

跨國集團並未使民族國家消失，跨國集團甚至需要弱小的民族國家。另一個問題是：在客觀上已經獲得真實跨國性的跨國集團，是否已完全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呢？以下，我們繼續以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為例探討。

戴姆勒／克萊斯勒，多麼奇怪的名字，它應該象徵著：此一跨國集團已成為真正跨國的了，它不再只是代表單一國家。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德國人依然認為戴姆勒／克萊斯勒是德國的。一方面，原本的戴姆勒－賓士集團實力比克萊斯勒集團強；一方面，合併後的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的總部仍位於原戴姆勒－賓士集團的總部所在地－德國司徒嘉特（Stuttgart）。1999年十月間，德國謠傳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要將總部遷往美國，德國輿論的強烈反彈，證實了上述說法。

德國新聞界透露，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要將總部遷往美國的理由是：兩大集團合併後股票下跌了三分之一，這是因為合併後總部位於德國，因此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的股票無法列在美國的道瓊指數（Dow-Jones-Index）內（原本的克萊斯勒股票當然是列在道瓊指數內的），而許多美國的投資大眾不習慣購買未列在道瓊指數上的股票。還有消息說，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若將總部遷往美國，其所繳的稅會比在德國時低（德國財政部長 Hans Eichel 隨即駁斥此一說法）。由於許多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的德國員工持有該集團股票，新聞界認為員工應該樂見該集團將總部遷往美國（如果這可使股價回升的話）（*Spiegel Online* 1999.10.7）。

事實上，總部的遷移主要是註冊地的轉變，對一國經濟的實質影響不大。然而，德國人在心理上是無法接受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將總部遷往美國的，因為如此一來，在心理上，這就真地是一個跨國集團而非德國的集團了。該集團是否真曾考慮過遷移總部，我們不得而知。然而當德國新聞界報導此一讓德國聯邦政府及司徒嘉特市政府都感到緊張的消息後，隨即遭到該集團的否認。1999年10月11日，該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委 Jürgen Schrempp 在其柏林代表處的開幕儀式中，正式否認了此一說法，並且表示：「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雖是全球企業，但並非無故鄉的企業。」所以該集團會留在德國，未來且將在德國投資 500 億馬克（*Spiegel Online* 1999.10.11）。

多麼妙的形容，「全球企業，但並非無故鄉的企業」，這表示了歷史悠久的大企業在全球化後、在客觀上取得真實跨國性後，仍無法在主觀上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

企業合併，甚至會牽涉到比民族國家範疇更大的文明圈認同。1999年10月14日，法國馬特拉航太公司（Aérospatiale Matra）與德國航太公司（DASA）（屬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宣佈了合併計劃。合併後的公司將稱為 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 Company（EADS），是美國波音公司、Lockheed公司之後的世界第三大航太公司。其總部預定設在荷蘭，但主要的營運基地仍是德國慕尼黑及法國巴黎。此項合併案不只是一個商業事件，還牽涉到歐洲認同。兩大公司宣佈合併後，即公開呼籲其他歐洲國家的航太公司也加入，為的是增加歐洲航太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實力。德國總理 Schröder 稱此一合併為「歐洲自主性的關鍵推動力」。（*Spiegel Online* 1999.10.14）。法國人甚至在此一合併案中看到其歐洲戰略的實踐，即以團結合作的歐洲與美國抗衡，法國國防部長 Alain Richard 對此一合併案發表評論時說：「〔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已成為可能。」（*Spiegel Online* 1999.11.8）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氛圍下，即使在經濟先進區域，企業衝突也會導致國與國間的衝突（或者說看起來像國與國間的衝突）。1999年11月間，英國行動電話集團 Vodafone 宣佈欲合併德國的 Mannesmann 集團。由於 Mannesmann 的管理階層拒絕合併，Vodafone 決定進行「敵意兼併」（即未經合併對象之同意，而以在股票市場上搜購股票的方式達成兼併）。然而 Vodafone 並非以現金搜購 Mannesmann 股票，而是以 53.7 張 Vodafone 股票換一張 Mannesmann 股票的方式，向 Mannesmann 股東（Mannesmann 的股權極為分散）招手。Vodafone 認為，這是讓 Mannesmann 股東來決定是否要與 Vodafone 合併（*Spiegel Online* 1999.11.19）。然而 Mannesmann 管理階層及員工仍極力抵制合併，宣稱一張 Mannesmann 股價絕不只值 53.7 張 Vodafone 股票。加以德國總理 Schröder 及其他一些德國政治人物，公開反對 Vodafone 不付現金的搜購股票方式（*Spiegel Online* 1999.11.20a），使得原已司空見慣的超大集團跨國兼併，在此案中染上了些許民族衝突的色彩。英國保守派的 *Times* 批評 Schröder 的做法是「對外國人的敵意」，並指責他將兩個企業間的鬥爭提升至國家層次，使其成為英國與德國間的衝突；左派的 *Guardian* 也批評 Schröder 搞不清狀況，以為 Mannesmann 還是德國企業，事實

上，Mannesmann 的股東大多在德國之外，然而目前德國的氣氛，卻似乎是 Mannesmann 在保衛「德意志祖國」（*Spiegel Online* 1999.11.20b）。

確實，客觀而言，Mannesmann 已不再（只）是德國的了。然而主觀上，許多德國人還是無法將其與德國分開。這個例子再次顯示，隨著全球化的深化，跨國企業的跨國性越來越真實，但主觀上仍無法脫離某一個民族國家的符碼。^[18]

（三）、普世人權與文明衝突 —北約對科索夫的「人道干預」與歐洲文化界線

在全球文化與文化多元主義同時並存的全球地方化時代，價值觀是否有普世主義的道路？抑或價值觀只能多元地並存或（沿著文明圈之間的界線）發生衝突？亦即，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是價值普遍主義（普世主義）還是價值相對主義、價值特殊主義？對此，貝克提出一種「脈絡關係的普遍主義」的解決方式，亦即個人或一個文明單位，均（可）認為其價值觀是普遍有效的（普遍主義），因此，世界上有許多種普遍主義。個人或文明單位遭遇他種普遍主義時，既不應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普遍主義，也不應以相對主義的心態滿足於互不干涉，而是各種普遍主義間應展開對話。以人權為例，人權一方面在幾乎所有的文化中都被認為是普世性的權利，然而人權是依附於社會脈絡中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常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所以，普世人權也有好幾個版本，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版本或是不干涉都是不對的，應該做的是讓不同的人權觀展開對話（Beck 1999: 114-117）。

然而，至今我們很少見到不同的普世人權觀展開理性的對話。反之，1999年，西方國家的一場攻擊行動，據稱是普世人權的實踐，但經過以下的分析，我們會明白，文明的衝突再一次披上了道德絕對主義的外衣。

當塞爾維亞人在科索夫迫害阿爾巴尼亞人，北約對南斯拉夫政治施壓無效，終致派機轟炸南斯拉夫，並以「人道干預」為出師之名，似乎「普世人權」已成為西方國家的信仰和行動準則。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教授 Bruno Simma 便指出，塞爾維亞人在科索夫所做的不能算「侵略」，因為科索夫是南斯拉夫的領土，反倒是北約在無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情況下，攻擊一個

主權國家，已違反了國際法原則。然而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攻擊是為了維護人權，因此此一攻擊行動是一種「可原諒的罪」，是「人道干預」（*Spiegel Online* 1999. 3. 25a）。德國總統 Roman Herzog 也認為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攻擊是一種「為了第三者的正當防衛行為」。Herzog 並且認為，德國參與北約的攻擊行動，不是要證明德國主權地位的正常化（詳下），而是表示過去幾十年來人權已經成為德國人的核心價值（*Der Spiegel* 1999（14）c）。德國政府不但宣稱這是人權之戰，並希望發現塞爾維亞人在科索夫設置集中營的證據，以為此戰合法化（*Der Spiegel* 1999（14）b）^[19]。總之，相信北約攻擊行動正當性的說法，都揭櫫出一種「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也就是說，某些基本人權是俱有普世有效性的，其實現與維護，應不受國界與國家主權的限制（參閱 Bretherton 1998）。

北約為救援科索夫的阿爾巴尼亞人，而對南斯拉夫發動攻擊，真地是「普世人權」的實踐嗎？只要與下列兩事對照：僅僅數年前，當盧安達發生種族大屠殺時，西方國家並無興趣以戰爭手段進行「人道干預」；1999年11月間，「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ZE）高峰會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通過了歐洲安全憲章，期望 OSZE 能有更大的力量防止和調解歐洲內部的衝突。該次高峰會的焦點問題是俄羅斯在車臣的軍事行動，車臣屬俄羅斯，有如科索夫屬南斯拉夫，車臣問題與科索夫問題頗類似，但西方國家只敢表達調解的意願，但只要俄羅斯不讓步，西方國家很難介入（*Die Welt* 1999. 11. 20），更不敢以軍事行動「人道干預」。由此可知，「普世人權」的說法不能反映出所有的事實。那麼，北約攻擊南斯拉夫，還為了甚麼呢？

美國的企圖似乎是較明顯的。冷戰結束後，美國成了維一的超級強國。一個超級強國，是不能放過宣示其宰制地位的機會的。然而北約的歐洲國家，又為什麼不惜對南斯拉夫動武呢？

有一種可能是，北約的歐洲國家，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亦即擔心位於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其種族衝突會波及歐洲其它區域，因而出兵干預。然而，如果北約僅只是想追求巴爾幹半島的安定，最划算的策略應是支持原南斯拉夫聯邦的完整。然而，北約卻反其道而行，對脫離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赫哲格維那，均予於承認和支持。

還有，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各方均有不人道的行為，然而主要西方國家（尤其是德國、美國、英國），卻集中譴責塞爾維亞。即以科索夫問題而論，南斯拉夫強人狄托去世後，佔科索夫總人口 87.4% 的阿爾巴尼亞人，亟欲把境內的塞爾維亞人驅離，頗引起塞爾維亞人的不安（*Der Spiegel* 1999 (14) a）。1995 年，北約轟炸塞爾維亞人居住的 Krajina（在克羅埃西亞境內，與波士尼亞／赫哲格維那相鄰），結果克羅埃西亞利用此一機會，將 Krajina 約 20 萬塞爾維亞人驅離，大批難民擁入塞爾維亞。為了報復，當時的南斯拉夫聯邦總統 Cošić 有意將阿爾巴尼亞人逐出科索夫，以安置塞爾維亞難民。事實上，原塞爾維亞總統、後來的南斯拉夫聯邦總統 Milošević 一直在阻止此一驅離阿爾巴尼亞人的計劃，但終究屈服於激進派的要求。而北約因科索夫問題轟炸南斯拉夫，更刺激塞爾維亞人加快對阿爾巴尼亞人的驅逐。^[20] 至於科索夫阿爾巴尼亞人亦不乏對塞爾維亞人挑釁、迫害之舉。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前，1999 年一月，德國外交部次長 Wolfgang Ischinger 即曾公開表示，科索夫的阿爾巴尼亞民軍 UÇK 在進行軍事挑釁（Ischinger 1999）。南斯拉夫屈服於北約的轟炸後，阿爾巴尼亞人旋即迫害科索夫境內的塞爾維亞人和吉普賽人（*Der Spiegel* 1999 (28) : 126-128）。

西方文明與回教文明的矛盾由來已久。然而，當波士尼亞／赫哲格維那的回教徒及信奉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發生衝突時，西方國家卻聲援這些回教徒。反之，俄羅斯則始終支持塞爾維亞。俄羅斯外交部長 Iwanow 強烈抨擊北約的轟炸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略及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種族屠殺。北約攻擊南斯拉夫期間，俄羅斯關閉了北約在莫斯科的代表處，對南斯拉夫則提供「人道援助」（*Spiegel Online* 1999. 3. 25b）。西方國家與俄羅斯態度迥異，原因是甚麼呢？

回顧一下歷史，也許能找到答案。1999 年的科索夫風雲，幾乎是 1913 年的翻版。科索夫曾是塞爾維亞的核心部份，但 1389 年 Amselfeld 一役，塞爾維亞敗於土耳其，塞爾維亞人因此遷出該地（*Spiegel Online* 1999. 3. 25c, 1999. 04. 02a）。當土耳其人退出巴爾幹半島後，塞爾維亞欲奪回科索夫，並對當地信奉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進行迫害（至少從 17 世紀起，阿爾巴尼亞人即已遷入科索夫）。1913 年，西方強權出面干預，在西方強權的支持下，阿爾巴

尼亞人得以建國。但西方強權此舉並非基於人道理由，而是要阻止塞爾維亞人的勢力抵達地中海岸。然而俄羅斯出面支持塞爾維亞，終究使塞爾維亞獲得了科索夫（*Die Zeit* 1999（14））。

當土耳其仍據有巴爾幹半島時，奧匈帝國的日耳曼皇朝需要塞爾維亞人的力量抵抗土耳其的勢力。但當土耳其退出巴爾幹半島後，塞爾維亞反成了奧匈帝國在東南歐擴張的阻礙（*Die Zeit* 1999（14））。日耳曼民族與塞爾維亞人的衝突越演越烈，終於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時代，德國則利用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屠殺了不少塞爾維亞人。

今天的西方國家一樣不是真心幫助阿爾巴尼亞人。他們雖以「人權高於主權」為藉口，出兵干預科索夫問題，但卻反對科索夫脫離南斯拉夫，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強化「大阿爾巴尼亞主義」，引起巴爾幹半島另一波動盪。除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人還分佈於馬其頓的西半部、蒙特內格羅（Montenegro）（亦屬南斯拉夫）南部的三分之一、希臘北部省份的部份區域。科索夫若脫離南斯拉夫，會催化上述區域阿爾巴尼亞人的分離運動（*Die Zeit* 1999（14））。

回顧歷史，即可知道日耳曼人與塞爾維亞人的衝突由來已久，而俄羅斯則始終支持塞爾維亞。這不僅僅是因為後兩者同屬斯拉夫民族，也因為其均信奉希臘東正教。反之，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埃西亞人，雖然亦屬斯拉夫民族，但信奉羅馬天主教，因此與西方世界較為接近。冷戰後，兩者在脫離南斯拉夫獨立一事上，亦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

反之，信奉東正教的北約成員國希臘，雖不敢背離北約，但其對南斯拉夫問題的態度，在北約中卻屬異數（參閱 Huntington 1997: 218-219），且其心理上，較同情塞爾維亞人。當馬其頓於 1992 年脫離南斯拉夫獨立時，遭到希臘的強烈反對，因為希臘認為馬其頓是希臘的一部份。希臘甚至想同塞爾維亞瓜分馬其頓，並對馬其頓實施經濟封鎖。最後由於美國施壓，希臘才在 1995 年承認馬其頓（*Die Zeit* 1999（14））。1999 年 11 月 20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參加過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高峰會後，由伊斯坦堡轉往希臘訪問，在雅典遭遇上萬名左派群眾帶暴力行為的激烈示威，示威群眾強烈譴責美國帶頭對南斯拉夫進行轟炸

(*Spiegel Online* 1999. 11. 20c)。因南斯拉夫問題而引起如此強烈的反美情緒，這在北約成員國中是很特別的。

南斯拉夫問題可能最能證明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有某種程度的適用性。事實上，一條宗教界線將歐洲分為「東方歐洲」與「西方歐洲」兩個世界，界線以東是希臘東正教的世界，界線以西是羅馬天主教及由其衍生之各種新教宗派。信奉希臘東正教者多為斯拉夫民族，然而亦有斯拉夫民族信奉天主教者（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他們的地緣位置正處於東方歐洲與西方歐洲的交會處，可以灰色地帶稱之（孫治本 1999: 83-84）。

這條文化界線可上溯至東、西羅馬帝國之分裂及希臘文明與羅馬文明之衝突。然而在二次大戰終了以前的歐洲近代史，歐洲民族國家間的結盟關係經常是跨越此條文化界線的。例如法國大革命以後，英國、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結盟對抗法國；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法國、俄羅斯、塞爾維亞聯合起來對抗德國。冷戰時期，東、西大集團對抗的局面首度出現，然而前述信奉天主教的灰色區域，是屬於東方陣營的。冷戰結束後，此一灰色區域才投向西方^[21]，以宗教為界的歐洲文明衝突，開始明顯地影響歐洲的地緣政治。如此即不難明瞭，為何成員國幾全屬西方歐洲的北約，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常偏袒塞爾維亞的敵對者，唯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態度較特別。至於東方歐洲的老大俄羅斯，支持塞爾維亞更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即使在西方陣營中，對南斯拉夫問題的態度也不是很一致。北約開始對南斯拉夫發動攻擊後，巴黎、羅馬、米蘭便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戰示威，教宗也於復活節講話中要求停火。德國要較晚才出現反戰示威（*Der Spiegel* 1999 (14) b），反戰的德國前財政部長、前社會民主黨主席 Oskar Lafontaine 甚至抱怨德國只有數場小規模的示威（Lafontaine 1999: 247-248）。這幾年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德國表現了突出的（干預）興趣。事實上，這個世紀德國命運的轉變常與南斯拉夫連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南斯拉夫問題而起，而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後，南斯拉夫問題則提供德國「主權地位正常化」^[22]的機會，並使德國於戰後首度派遣戰鬥部隊至北約以外的地區。還有一種說法是，德國參戰，是要避免「特殊之路」，也就是德國不能成為西方陣營

中的異數，要向全世界宣示德國屬於西方聯盟（*Der Spiegel* 1999（45）），其目的則是避免其他西方歐洲國家對統一後成為歐洲強權的德國的疑懼。德國外交部長 Fischer 還曾說，參戰是為了不使人覺得德國與美國疏離（*Der Spiegel* 1999（14）b）。這是因為冷戰後德國仍視俄羅斯為頭號潛在敵人，故希望美國的勢力留在歐洲，以為制衡。

事實上，冷戰結束後，德國對其歐洲政策，常主觀地解釋其目的是要宣示德國維持其與西方國家結盟關係的決心，所以在參與攻擊南斯拉夫一事上，也出現了這樣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忽略了德國歷史潛意識中對塞爾維亞的敵視。法國、義大利民情對北約攻擊行動的相對冷淡，實因其與塞爾維亞的關係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塞爾維亞與法國、義大利且係盟友）。德國口稱要避免特殊之路，然而南斯拉夫問題幾乎是德國的特殊之路所激化的：前已述及，避免南斯拉夫的分裂，才是合乎歐洲利益的。因此一開始，法國、英國、美國都反對支持克羅埃西亞等的獨立運動，然而德國不顧法、英、美的反對，執意承認由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國家（Lafontaine 1999: 246），逼使其他西方國家不得不跟進承認。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北約攻擊南斯拉夫有維護（阿爾巴尼亞人的）人權的用意，但此一事件文明衝突的成份，實大於普世人權的實踐，

五、結語

全球化確實削弱了民族國家、改變了空間（概念）、複雜化了認同。全球化消除了「遠方」，使各種事件都可跨國地進行，然而這種可稱之為「解空間化」的力量，因其可使任何地方都不再「偏遠」，也使實體地方空間有可能在全球範圍獲得資源，造成地方與社區的復興。「解空間化」使民族不再與固定疆域聯結，但也正是「解空間化」，塑造了「來自遠方的民族主義」，支持著跨國民族社會空間。即使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跨國性越來越真實的跨國集團，也仍未脫離民族國家的符碼。

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二次現代，（各種）全球視野、地方（社區）意識、民族主義，可能兼容並蓄、可能激烈衝突。即使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社會，也在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行動中，暴露出對「普世人權」的帝國主義及文明中心主義的濫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的第一次現代確實是解構了，第二次現代則尚未出現理論上、實踐上清晰的架構。然而第二次現代未必就是永恆的、解構的後現代。關於跨國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努力若能成功，則第二次現代一方面將是包容的、多元的，一方面也將是有結構、有秩序的。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孫治本

1995 <德國人口結構老化對法定退休保險的影響及因應之道>，《思與言》（33-1）：135-160。

1999 <世紀末解構的歐洲—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限與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當代》（139）：80-93。

Beck, Ulrich

1999 《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台北：商務。

Bryan, Lowell/Farrell, Diana

1997 《無疆界市場》（汪仲譯），台北：時報文化。

Giddens, Anthony

1999 《第三條路》（鄭武國譯），台北：聯經。

Huntington, Samuel P.

1997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黃裕美譯），台北：聯經。

Soros, George

1998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聯合報編譯組譯），台北：聯經。

二、德、英文部份：

Albrow, Martin

1998a *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Frankfurt/M.

1998b Auf Reisen jenseits der Heimat. Soziale Landschaften in einer globalen Stadt, S. 288-314 in Ulrich Beck (Hg.) :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Appadurai, Arjun

1998 Globale ethnische Räume, S. 11-40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Bauman, Zygmunt

1998 Globalisierung und die Spaltung der Weltgesellschaft, S. 315-332 in Ulrich Beck (Hg.) : *Kinder der Freiheit*, Frankfurt/M.

Beck, Ulrich

1998 Wie wird Demokratie im Zeitaler der Globalisierung möglich? – Eine Einleitung, S. 7-66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Beck-Gernsheim, Elisabeth

1998 Schwarze Junden und griechische Deutsche, S. 125-167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Bretherton, Charlotte

1998 Allgemeine Menschenrechte, S. 256-292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Buttler, Günter

1993 Deutschlands Wirtschaft braucht Einwanderer, S. 51-64 in H.-U. Klose (Hg.) : *Altern der Gesellschaft*, Köln.

Der Spiegel

- 1999 (2) Der Kampf um die Pässe (pp. 22-32)
- 1999 (14) a Sehnsucht nach Tito
(www.spiegel.de/spiegel/nf/0,1518,15592,00.html)
- 1999 (14) b “Ich darf nicht wackeln”
(www.spiegel.de/spiegel/nf/0,1518,15571,00.html)
- 1999 (14) c “Ein Fall von Notwehr”
(www.spiegel.de/spiegel/nf/0,1518,15505,00.html)
- 1999 (28) Zentrale des Irrsinns (pp. 126-128)
- 1999 (45) Planetarische Visionen
(www.spiegel.de/spiegel/0,1518,51256,00.html)
- 2000 (6) „Wir haben den Krieg gewonnen“
(www.spiegel.de/spiegel/0,1518,63013,00.html)

Dettling, Warnfried

- 1998 *Wirtschaftskummerland - Wege aus der Globalisierungsfalle*,
München.

Deutscher Bundestag

- 1989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onn.

Die Welt

- 1999.11.20 Rußland fühlt sich zu nichts verpflichtet
(www.welt.de/daten/1999/11/20/1120au138882.htx)

Die Zeit

- 1999 (14) Europas langer Schatten
(www.ZEIT.de/tag/aktuell/199914.balkan-domino_.html)

Eichel, Hans/Hoffmann, Hilmar (ed.)

- 1999 *Ende des Staates – Anfang der Bürgergesellschaft. Über die
Zukunft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Hessen im Dialog/ RömerbergGespräche 1998) , Reinbek.

Fischer, Joschka

1999 *Für einen neuen Gesellschaftsvertrag – Eine politische Antwort auf die globale Revolution*, Köln.

Giddens, Anthony

1999 *Jenseits von Links und Rechts* (aus dem Englischen von Joachim Schulte) (3. Auflage) , Frankfurt/M.

Goodman, James

1998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eue Demokratieformen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 S. 331-373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Habermas, Jürgen

1998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 Bemerkungen zu Folgeproblemen der wirtschaftlichen Globalisierung, S. 67-84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Handelsblatt

1993.5.13

Hauchler, Ingomar/Messner, Dirk/Nuscheler, Franz (ed.) (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1997 *Globale Trends 1998*, Frankfurt/M.

Ischinger, Wolfgang

1999 *Perspektiven deutsch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Vortrag beim 7. Aktuellen Forum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akademie für Sicherheitspolitik für Chefredakteure am 27.01.1999, Bad Neuenahr
(www.auswaertiges-amt.de/3_auspol/2/3-2-1a.htm) .

Kirby, Andrew

1999 Wider die Ortlosigkeit, S. 168-175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Lafontaine, Oskar

- 1999 *Das Herz schlägt links*, München.
- Luhmann, Niklas
- 1998 Der Staat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S. 345-380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 manager magazin*
- 1998 (5) Global daneben (pp. 54-65)
- McGrew, Anthony
- 1998 Demokratie ohne Grenzen? S. 374-422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 Meyrowitz, Joshua
- 1998 Das generalisierte Anderswo, S. 176-191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 Pieterse, Jan Nederveen
- 1998 Der Melange-Effekt, S. 87-12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 Pries, Ludger
- 1998 Transnationale soziale Räume, S. 55-86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 Robertson, Roland
- 1998 Glokalisierung: Homogenität und Heterogenität in Raum und
Zeit, S. 192-220 in Ulrich Beck (Beck)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 Rosenau, James
-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Brighton.
- Ruge, Peter/Elisabeth
- 1990 Nicht nur die Steine sprechen deutsch..., Frankfurt.
- Scharpf, Fritz W.
- 1998 Demokratie in der transnationalen Politik, S. 228-253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Shaw, Martin

- 1998 Die Repräsentation ferner Konflikte und die globale
Zivilgesellschaft, S. 221-255 in Ulrich Beck (Hg.) :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Schulze, Hagen

- 1999 *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Limitierte
Sonderauflage) , München.

Smith, Anthony D.

- 1990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p. 171-191 in Mike Featherstone
(edit.) : *Global Culture*, London

Spiegel Online

- 1998.12.01 Deutsch-französische Achse frisch poliert
(www.spiegel.de/homepage/deutschland/gipfel2_in.html)
- 1999.03.25a Interview: Nato unter Begründungszwang
(www.spiegel.de/homepage/ausland/interviewsimma2.html)
- 1999.03.25b Rußland schlägt wieder härteren Ton an
(www.spiegel.de/homepage/ausland/natoausgewies_au.html)
- 1999.03.25c Pulverfaß Kosovo
(www.spiegel.de/homepage/ausland/stiwkosov_au.html)
- 1999.10.07 Daimler-Umzug rechnet sich nicht
(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0,1518,45504,00.html)
- 1999.10.11 „Kein heimatloses Unternehmen“
(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0,1518,46150,00.html)
- 1999.10.14 Dasa und Aérospatiale bilden Luftfahrtgiganten
(www.spiegel.de/wirtschaft/maerkte/0,1518,46974,00.html)
- 1999.11.17 Der Palm VII – der erste „Online-Palm“
(www.spiegel.de/netzwelt/technologie/0,1518,52767,00.html)
- 1999.11.18 New York – fast live
(www.spiegel.de/netzwelt/netzkultur/0,1518,52768,00.html)
- 1999.11.19 Neuer Höhepunkt in der Übernahmeschlacht

(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0,1518,53205,00.html)

1999.11.20a Schröder fordert Übernahmerichtlinien

(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0,1518,53234,00.html)

1999.11.20b Schröder ist „fremdenfeindlich“

(www.spiegel.de/wirtschaft/politik/0,1518,53264,00.html)

1999.11.20c Strassenschlachten bei Besuch Clintons

(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0,1518,53260,00.html)

2000.02.07 Experten sollen Gesetze zu feindlichen Übernahmen prüfen

(www.spiegel.de/wirtschaft/maerkte/0,1518,63234,00.html)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86 *Das moderne Weltsystem – Die Anfänge kapitalistischer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uropäische Weltökonomie im 16. Jahrhundert*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Angelika Schweikhart) , Frankfurt/M.

Wirtschaftswoche

1998.05.14 Völlig neue Regeln

(www.wiwo.de/cgi-bin/wiwo.exe?FN=WIWO&SFN=UM_DW&pv=)

Yalçın-Heckmann, Lale

1997 The Perils of Ethnic Associational Lie in Europe: Turkish Migrants in Germany and France, p. 95-110 in Modood, Tariq/Werbner, Pnina (edit.) :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Zürn, Michael

1998 Schwarz-Rot-Grün-Braun: Reaktionsweisen auf Denationalisierung, S. 297-330 in Ulrich Beck (Hg.) : *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1] 這迫使國家或者必須屈服於全球資本主義，或者必須以「跨國政治架構」取代（或補充）傳統的國家與國際架構，以使政治力能重新抗衡資本主義。關於「跨國政治」的問題，本文無法詳述，僅在四－（二）略為提及，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 Beck 1999: 144-150。

^[2] E. Alvater 及 B. Mahnkopf 如此形容全球化所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轉變：「『時間緊密的地球』（zeitkompakter Globus）形成了。如今，不同世界領域和不同意義的事件不再被定位於一個，而是數個不同的時間軸。．．．從經濟上而言，地球不再是有著許多遠方國家的廣大世界，而是緊密、狹小，包含著許多藉著通信技術連接在一起的（貨幣）市場。這是因為只需花些微成本就能克服空間距離以及原本所需的時間支出，這些成本很少算一回事。」（*Die globale Ökonomi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Widerspruch*, 31, 16. Jg. 1996, S. 21f；轉引自 Beck 1999: 31）

^[3] 亦即無疆界、不受經濟以外力量束縛的市場，參閱 Bryan & Farrell 1997。

^[4] Jan Nederveen Pieterse 整理出五位重要學者對全球化開始年代的看法：

學者對全球化的開始年代有非常不同的意見

學 者	開始年代	主 題
馬克斯	約 1500	現代資本主義
華勒斯坦	約 1500	現代世界體系
Robertson	約 1500, 1870-1920	包括多個面向
吉登斯	約 1800	現代
Tomlinson	約 1960	文化全球化

Pieterse 1998: 91。

^[5] 當然，如果我們將全球化的開始年代定位於約 1500 年，則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全球化的開始是同步進行的事件，前者甚至可能是後者的結果，但在全球化的現階段，全球化反而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實力（Pieterse 1998: 94）。然而筆者基於「疆界毀壞」的全球化定義，認為至少要到冷戰結束以後，（成熟的）全球化才成形，而全球化的主要特徵之一即是民族國家的式微。

^[6] 傳統中國只有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以及政治上對朝代（最高統治家族）的效忠；由於國家的概念尚未形成，最高權力的概念是歸屬於朝代或皇帝個人，朝代改變即被視為「變天」。中古歐洲的認同對象是基督宗教和地方文化，一國之政權亦分散於諸封建領主手中。現代的民族國家要到十五世紀末才逐漸在歐洲形成，其過程可參閱 Schulze 1999。

^[7] 「多中心世界政治」的論點係 James Rosenau (1990) 所提出，這裡主要參考貝克的詮釋（Beck 1999: 49-51）。

^[8] 關於全球化使民族國家式微，參閱 Albrow 1998a; Beck 1999: 2-10 & 144; Fischer 1999; Habermas 1998。對於「解民族國家化」的各種反動方式，參閱 Zürn 1998。

^[9] 可參閱貝克對「世界『麥當勞化』」（亦即大一統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論點的反駁（Beck 1999: 59-64），及 Robertson 對全球地方化和文化帝國主義論點的討論（Robertson 1998: 211-215）。另可參閱 Smith 1990。

^[10] 在國家的模式中，則是公民間的關係直接由國家規範（Luhmann 1998: 365）。

^[11] 關於跨國民主，參閱 Beck 1998; Scharpf 1998; McGrew 1998。

^[12] 關於國家與公民社會，參閱 Giddens 1999: 79-110; Dettling 1998: 237-300。最近德國知識界興起關於公民社會是否能取代國家（或公民社會與國家之互補關係）的討論，例如 1998 年，德國黑森（Hessen）邦政府與「羅馬人山論壇」（RömerbergGespräche）召集了一場名為「國家的終點—公民社會的起點：關於全球化時代社會民主的前途」研討會，見 Eichel/Hoffmann (ed.) 1999。

^[13] 關於跨國公民社會，參閱 Beck 1999: 90-119; Shaw 1998。

^[14] 在全球化以前的現代（傳統的現代；或如貝克所稱的「第一次現代」（Beck 1999: 12；第一次現代之後則是「第二次現代」）），社會常被認知為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日本社會、德國社會）。貝克稱此為：「領土國家成了社會的貨櫃。」（Beck 1999: 90）

^[15] 當然，這並不是說實體空間、實體地方真地不重要了，而是說空間距離阻隔溝通的力量越來越小。但實體地方仍是社會事件發生的主要場域，參閱 Kirby 1998。

^[16] 而且即使是最殘忍、最絕望的事件（戰爭中的屠殺、饑荒等），都可能成為文化工業刺激消費者想像力的素材（Appadurai 1998: 22-23）。

^[17] 針對東亞金融危機，知名投資人 George Soros 呼籲建立適當的國際金融監督及管理機構，並主張民主國家應彼此合作，建立全球性的開放社會，才能因應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問題（Soros 1998: 175-193 & 213-239）。

^[18] 2000 年二月三日，由於獲悉 Mannesmann 大部份的小股東同意 Vodafone 交換股票的條件，Mannesmann 管理階層被迫與 Vodafone 達成合併的協議，原 Mannesmann 集團的股東可持有合併後的集團 49.5% 的股份（較 Vodafone 最初的提議多了兩個百分點）。此一表面上「善意的兼併」，由於 Mannesmann 管理階層未能爭取到 50% 以上的持股比例，仍被德國輿論界視為德國管理階層的重大措敗（*Der Spiegel* 2000（6）），德國總理施洛德且宣佈成立委員會，調查是否有必要立法限制敵意兼併（*Spiegel Online* 2000.02.07）。

^[19] 希特勒時代德國集中營內的屠殺，是戰後德國戰犯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其他西方國家的人，甚至認為整個德國民族都應對此負責。因此，戰後德國人一方面深切反省；一方面在潛意識中，想發現其他民族也會做這種事的證據，以使集中營不再只是德國獨有的烙印。在北約攻擊南斯拉夫期間，一些德國政要喊出了「絕不讓 Auschwitz 再發生」的口號（Lafontaine 1999: 248-249）。Auschwitz 是希特勒時代最有名的猶太人集中營。德國人喊出這樣的口號，表面上是從德國本身的歷史教訓中，體會出集中營的慘絕人寰，因此絕不能讓集中營的悲劇在任何地方重演。實際上，在潛意識中，是想向世人宣告：不是只有德國人才會設立集中營。

^[20] 此為德國前總理 Willy Brandt 總理辦公室主任 Horst Grabert 的說法，轉引自 Lafontaine 1999: 40-41。由於北約的支持，克羅埃西亞贏得對塞爾維亞的戰爭，並將一共約 40 萬塞爾維亞人驅離 Krjina 及東斯拉沃尼亞（Ostslawonien）（*Der Spiegel* 1999（14）a）。

^[21] 波蘭外長 Bronislaw Geremek：「柏林圍牆的倒塌標識著波蘭的重返歐洲。」（*Spiegel Online* 1999.11.8）他所謂的歐洲實指西方歐洲。

^[22] 二次大戰後由於德國為戰敗國，其國防、外交均受法律上或歷史經驗所產生的主觀禁忌的限制。主權正常化則是要取消這些限制。